

关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調查 研究的一些意見

丁声树

我想简单談談个人对于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調查研究的一些初步的意見。

从1956年起,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根据国务院1956年2月关于推广普通話的指示,在党的統一领导下,組織了各省、市、自治区教育厅、局和高等院校,进行全国汉语方言初步普查。几年来,汉语方言普查工作在各地党委领导之下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次方言普查,适应推广普通話的要求,是以語音为調查重点,以当时的县(或者与县相当的行政单位)为調查对象,平均一县調查一点。到1958年秋季,全部方言普查工作基本上完成了。調查了1,800多点;写成的調查报告将近1,200份;根据方言和普通話的語音对应規律編写的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話的手册320多种(其中正式出版的有40多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分別編印了《方言与普通話集刊》、《方言和普通話丛刊》。从1959年起,各省区又依照教育部的指示,根据普查材料編写本地区的方言概況。就目前(1960年12月初)了解到的,有八个省区的方言概況已經編写完成。《江苏省和上海市方言概況》已經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1960年7月第1版,813頁)。《河北方言概況》已經交到河北人民出版社,也快要印出来了。广西、湖北、河南、甘肃、貴州、福建六个省区的方言概況已經自行油印或鉛印成书。

这次汉语方言普查,成績是很大的。只有在今天社会主义制度下,在今天党的领导下,組織了全国教育厅、局和高等院校的力量,貫徹了党的群众路綫,才能在短短的几年之內完成了这样一个巨大的任务。最主要的收穫有三項:(1)这次汉语方言普查有鮮明的为当前政治服务的目标,为推广以北京語音为标准音的普通話服务。通过普查,找出了方言和普通話的語音对应規律,編印了各方言地区人民学习普通話的手册,有力地促进了推广普通話的教学工作。(2)通过普查,积累了不少的方言材料,可以供高等院校語文教学的

参考,也可以供进一步調查研究的参考。比如各省区編写的方言概況就是編纂全国汉语方言概要的重要参考书。(3)尤其可喜的是,通过普查,鍛炼出来了一批方言調查干部,壮大了語言工作者的队伍。这是我国語言学界一支很可珍貴的生力軍。参加这次普查的主要是青年同志。他們在党的领导下走到方言普查的第一綫,遇到了困难就分析困难,克服困难;发现了問題就研究問題,解決問題。他們在工作中不断地与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調查方法作斗争,在斗争中成長起来了。通过調查和編写工作,他們的业务水平都提高了一步。实践証明,这样在工作中学习,边于边学,是培养青年干部的有效办法。

从1956年起,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合办了一个普通話語音研究班(現在是由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教育部和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三个机构合办的)。这个普通話語音研究班已經办了九期,培养了1,600多名推广普通話的骨干。其中第一、二、三期毕业的学员都受过方言調查的基本訓練;他們在方言普查工作中起了积极的作用。許多高等院校开设了汉语方言課程,也培养了不少的青年干部。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为方言普查編印了一些調查表格、調查手册,对于普查工作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科学院各地分院語言文学研究所也做了一些方言調查工作。

以上所有这些工作都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汉语方言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有利的条件。

汉语方言十分复杂,其中蘊藏的問題也是非常丰富的。几年来的初步普查,以語音为重点,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汉语方言的詞汇、語法还没有来得及詳

*編者按:从7頁到13頁这四篇文章轉載自《新建办1961年第1期,都是1960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上有关語言工作的发言。

調查，自然还远远不能够把汉语方言的全部面貌都弄清楚。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还需要在普查的基础上，继续深入，逐步提高。方言的语音调查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但是方言研究如果只偏重在语音调查一个方面，那就是很不够的。汉语方言的词汇、语法也必须做系统的调查研究，才能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服务，才能为语文教学和汉语史研究提供更翔实的参考材料。就是对于语音方面许多问题，如儿化、轻声、连音变化等等，也需要通过词汇、语法的深入研究，我们才能得到比较全面的了解。也只有方言的语音、词汇、语法三方面都经过了系统的调查研究，我们才能弄清楚汉语方言的全部面貌，才能把汉语方言学建立在一个比较稳固的基础之上。

因此，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进一步开展汉语方言的调查研究在当前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对于进一步推广普通话，进一步促进汉语规范化，具有重大的实际意义。这是因为方言和普通话不单在语音方面分歧很大，就是词汇方面也有不少严重的分歧现象。最常见的是同一样东西，各方言的叫名不一致。比如“向日葵”在方言中就有“葵花、朝日葵、朝阳葵、转日葵、转日莲、望日莲、照日莲、老爷转、爷爷转、朝爷花、日头花、朝阳花、朝日转、日头转、朝日蒲、向日黄”等等不同的名称。“太阳”在方言中就有“日头、热头、老爷儿、爷爷儿、日头爷、佛爷、前天爷、前佛爷、阳婆爷、月家”等等不同的名称。也常有同一个叫名，各方言的含义不一致。比如普通话说“山药”，指的是“薯蕷”。可是河北省有些地区说“山药”指的是“甘薯”（白薯）。另外有些地区说“山药”，指的是“马铃薯”。“大头菜”在普通话里指的是一种“芥菜”。可是河北和东北有些地区说“大头菜”指的是“洋白菜”。“包子”和“馒头”在普通话里是有分别的，“包子”带馅儿，“馒头”不带馅儿。可是吴语有些方言，带馅儿的也叫“馒头”，那就是说“包子”也叫“馒头”。另一方面，河北省有一些方言，不带馅儿的也叫“包子”，换言之，“馒头”也叫“包子”（还有些地区把“饺子”叫做“包子”的）。这些词汇方面的分歧，也象语音方面的分歧一样，经常引起互相了解的困难，妨碍着各地区人民的交际活动，对于生产斗争和社会斗争都是不利的。必须对方言的词汇做深入的细致的调查研究，具体地分析具体的问题，才能为确定普通话的词汇规范提供可靠的参考材料，才能更好地为推广普通话服务。

词汇调查对于确定普通话里某些语音规范，就是对于普通话审音工作，也是很有帮助的。试举一两

个例子。“酵母、发酵”的“酵”字有些人读如“教”，有些人读如“孝”，哪一个读音是正确的呢？从方言上看，读如“教”的音是正确的。发面用的“酵子”，也叫“面酵子”，这是北方许许多多的方言常用的词，“酵”字在口语里都是读如“教”，不是读如“孝”的。再从历史上看，唐代玄应《一切经音义》卷二“酵糜”条注云：“案韵集音古孝反，酒酵也，谓起麴酒也。”《广韵》去声效韵“酵”字注云：“酒酵”，音“古孝切”，《集韵》去声效韵“酵”字音“居效切”，都与“教”字同音。所以“酵”字读如“教”也是与历史上相沿的读法相符合的。（北京话说“引子”，不说“酵子”。北方也还有一些方言说“引子”或者“起子”，不说“酵子”。）

再举一例。“蓼麻”这个草的名称，有些人读如“寻麻”，有些人读如“潜麻”，哪个读法是正确的呢？从方言上看，读如“潜麻”的音是正确的。蓼麻主要生长在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是这些地区常见的一种野草，茎根纤维，沟沿道旁，随处可以看到。这一带人民对于这个野草的叫名，其音正是读如“潜麻”，不是读如“寻麻”的（四川有些地区也叫“蠹麻”，“蠹”字音整。这个野草枝叶上有许多刺毛，触人皮肤，痛如蜂子蜇了似的，所以叫“蠹麻”。“蠹”就是“蜇”的意思）。再从历史上看，“蠹麻”的“蠹”，古书里写作“藜”。唐代大诗人杜甫在成都做过一首“除草”诗，自注云：“去藜草也”，“藜草”就是“蠹麻”。杜诗旧注：“藜”字“音潜”。南宋初年张邦基的《墨庄漫录》卷七描写过这个野草，说：“土人呼为藜麻”，自注：“音潜”。《集韵》平声盐韵“藜”字音“慈盐切”，与“潜”同音。所以无论从方言上或是从历史上看，“蓼麻”都是应当读如“潜麻”。

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方言的调查研究对于汉语规范化具有很重要的实际意义。同时也可以看出来，古汉语中许多成分还常常反映在今天人民的口头上。方言的调查研究对于探讨汉语的历史发展，对于探讨语源，也具有很大的学术意义。

我们建议汉语方言进一步的调查研究以词汇、语法为重点（语音方面也还要继续注意）。就当前推广普通话，汉语规范化的需要而论，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尤其重要。实际上不少高等院校中文系和中国科学院分院语言文学研究所已经做了一些方言词汇的调查工作。方言词汇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可以编成方言词典，也可以编成方言和普通话对照的词汇手册，还可以写成专著或者论文。方言语法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用专著或者论文的方式发表。

我们建议调查方式多样化，不拘一格。直接的现场调查和间接的通信调查可以适当地结合起来。单独

的地点方言可以調查，大片的地区方言也可以調查。就一县而論，人民委员会所在地(一般是县城)的方言可以調查，农村人民公社及其所屬各生产队的方言也可以調查。方言中固有的成分需要注意，新兴的成分也需要注意。

我們建議漢語方言調查研究与推广普通話、注音扫盲等工作更密切地結合起来，利用方言和普通話的語音对应規律，詞汇語法对比研究，积极为这些工作服务。

我們建議各地把本地区方言普查的經驗加以总结，在这个基础上制訂进一步的調查計劃，以詞汇語法为重点，开展工作。一般地講，本地区人調查本地区的方言比較容易做到多快好省。本地区的方言概況(根据普查材料編的)尚未編写完成的，儘快編写，以便早日安排下一步工作。建議中国科学院語言研究所綜合各省区編印的方言概況，写成全国漢語方言概要，作为計劃中《漢語方言学》一书的組成部分。

我們建議有条件的高等院校中文系儘可能開設漢語方言課程，把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列入教学計劃，并且使这个工作与語文教学更密切地結合起来，利用研究成果来丰富語文教学的内容。建議中国科学院各地

分院語言文学研究所把漢語方言調查研究列入工作計劃。

我們建議各省、市、区正在編纂的地方志儘可能把本地区的漢語方言包括在內。一个地区的方言(特别是在詞汇方面)往往可以反映这个地区人民历史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所以地方志有必要把本地区的方言編写进去。我国历代編的地方志也常常有方言一門，但是一般都是簡略疏漏，沒有經過調查研究的。新修的方志如果編写方言部分，希望能与本地区的方言調查工作联系起来，把本地区的方言系統地做一番調查研究，然后再編到方志里。

以上都是一些不成熟的初步意見，提出來敬請各位批評指正。

各位委員，各位同志，党的領導和党領導下的群众路綫，是做好一切工作的根本保証。几年来全国漢語方言普查取得的初步成就，同其他各部門所取得的成就一样，都是党的領導的胜利，党的群众路綫的胜利。我們深信，只要繼續加强党的領導，坚决貫徹党的群众路綫，充分运用新生力量，漢語方言进一步的調查研究工作一定能够取得更大的成績。

少数民族語文工作的巨大成績*

包尔汉

我国的少数民族語文工作，在党的正确領導和总路綫、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紅旗的光輝照耀下，由于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以及語文工作干部的积极工作，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少数民族語言研究所根据党的民族語文工作的方針政策和任务，三年来，在民族文字工作方面，帮助侗族創制了文字，帮助蒙古族、維吾尔族、哈薩克族改革了文字。对藏族书面語口語化的問題，也在1960年下半年开始同中央民族出版社等单位协作进行研究。截至目前为止，已經帮助僮、苗、彝、侗、布依、黎、哈尼、傣、佤、納西等10个民族創制了文字；帮助維吾尔、蒙古、哈薩克、傣、景頗、拉祜等6个民族設計了新文字方案。在已經創制和改革的民族文字中，正分別进行

推行、試驗推行或在重点試驗中，并都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僮文方案在僮族地区逐步推行以来，到1960年6月止，已有140万青壯年达到四会(讀、写、講、用)，脱离了文盲状态，約占青壯年扫盲对象的百分之七十。实践証明，根据社会主义建設的需要和本族人民的意願而創制和改革了文字，既可以迅速地在群众中展开扫盲运动，普遍地提高文化，学习先进的生产經驗和科学技术知識，以适应經濟建設的需要；又可以更便利地向群众宣傳党的政策和政府的法令，也可以发展本族語言的文学、艺术，活跃本族人民的政治生活。因此，党帮助少数民族創制和改革文字的政策，受到了少数民族人民群众的普遍欢迎和热烈拥护。帮助少数民族

* 本篇轉載自《新建設》1931年第1期。請參看本期7頁脚注。